

强增长和强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选择

High Increase and Deepening Reform—Strategic Option of Establishment of Market Economy's System

白卫星

(《市场经济研究》杂志社 银川 750001)

建国已 40 多年,国民经济一直处于波动之中,平均每 5 年经历一个周期。1992 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进入第九个波动周期。在这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促进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已成为中国 90 年代中后期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值得关注的消费热点和投资热点

70 年代末,我国只有上海、天津等地生产电视机,走着自我封闭、自我繁殖的路子,年产黑白电视机仅 50 万台。80 年代末,中国的家电工业在“嫁接”路上跋涉了十年之后,彩电生产线便突破 100 条,年产量 800 多万台。黑白电视机尚未在神州大地站稳脚跟,就被铺天盖地的彩电浪潮淹没了。两者换代时间之短,使我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冠军,其原因在于家电已成为 80 年代的消费热点。

家电还会成为 90 年代的消费热点吗?就农村而言,1990 年农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彩电 4.72 台、黑白电视机 39.72 台、收录机 17.83 台、洗衣机 9.72 台、电冰箱 1.22 台。可见,家电在农村市场尚拥有相当大的潜力。假如农村按两亿个家庭计算,5 年内 20% 的家庭各增加电视机一台,30% 的家庭各增加收录机一台,就需要电视机 4000 万台,收录机 6000 万台。如此广阔的农村市场,使家电仍将是 90 年代农村的消费热点。

与农村不同的是,城市居民的住宅还很紧张。1990 年人均居住面积仅 6.7 平方米,只能说达到一般生活标准,满足了生存需要。根据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城市居民应基本上达到每户有一套住宅,人均居住面积争取达到 8~10 平方米。同时,城市居民最迫切的需要是进一步改善居住条件。住宅作为关系每个人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最重要的消费品,无疑会成为 90 年代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与此相应的是住宅热也必将带来室内装修热。目前,全

国装修业迅猛发展,其成为消费热点已成定局。

总的来看,90 年代的消费热点除家用电器(城市是高档次的)外,主要是住宅及其装修。

消费热点的形成,促成了投资热点。笔者认为,投资热点一是房地产业(建筑业),二是加工工业,三是流通业。由于城市居民对住宅的巨大需求和全国各地投资权限下放,使房地产业和加工工业对投资形成巨大引力,加上全国各地一哄而起的“开发区”和各种重复项目的建设。必将使房地产和加工工业成为 90 年代的投资热点。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流通产业的快速发展,全国各地纷纷“办公司”、“办实体”,资金不断投向流通产业。

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7 0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商品房投资高速增长。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 9 000 亿元,其中基建投资 3 500 亿元,其速度继续呈增长趋势。就投资结构而言,基础产业投资比例下降,加工工业投资比例上升,从而造成长线更长、短线更短,形成瓶颈制约,加剧了短缺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结构偏差的前提是其规模的偏大。双重的偏差推动资金的严重短缺,在投资膨胀的情况下,产生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债务链,形成“兵临城下”的严峻形势。

二、“滞胀”是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衡的交互作用下引发的

物价上涨是经济增长失衡的结果和表现。当物价涨幅达到 8% 时,即为中度通货膨胀,亦是国民经济中度失衡。若物价涨幅突破 10%,即是恶性通货膨胀,属国民经济严重失衡。无论从经济总量看,还是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从 80 年代以来的情况看,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衡又导致了 1985 年和 1989 年的“滞胀”。

先天不足的因素主要包括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计划体制、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协调、资源配置的失当和总需求与总供给的膨胀“错位”。建国后,我国开始了长达 40 多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使市场作用未能得到发挥,就业也好,资源配置也好,大都采用“人为”计划的办法,加之受苏联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和重工业的影响,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严重“错位”,消费资料短缺,形成长期以来一直隐蔽的需求膨胀。随着改革和开放的实行,隐埋了多年的“需求”炸弹伴随着农村改革第一步的成功和价格改革的开始发生爆炸,刺激着市场,对投资需求构成巨大拉力,形成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双胀”,酿成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抢购风潮”。通货膨胀的突然发生,使已经失衡的经济总量更加失衡,带来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终于使国民经济不断下滑,市场疲软,形成“滞胀”。

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消费推动着生产不断发展,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改革开放 10 多年,我们的高速发展证明了这个朴素道理是正确的。但是当人民生活刚刚有所改善,前几年就不断反所谓“需求膨胀”、“消费超前”、“经济过热”,采取一系列过当的措施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抽紧银根、限制消费、抑制需求,结果造成了资金拖欠、产品积压、需求不振、市场疲软,使消费落在生产的后面,拖住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从根本上来说,消费在前应当成为我们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通过 80 年代的改革,生产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要想再上一个台阶,就必须有新的消费需求,就是说消费需求也要上一个新台阶。

1992 年以来,由于投资规模的扩大及其结构的不合理,促使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矛盾加剧,“瓶颈”产业相对加工工业来说更“窄”,资源配置趋于紧张。特别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今年夏粮的减产,使交通运输和能源供应更加紧张,物价上涨难以控制。如今年上半年的服务性行业价格上涨就已突破两位数。若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建设工程有增无减,尤其是结构不作调整,必然对物价上涨推波助澜,形成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形势就会因此转向新的“滞胀”。

三、是否存在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一是指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经济增长,或促进,或促退。二是指经济增长要影响通货膨胀,或伴生,或引发,或消除。但这要具体看是什么样的通货膨胀。

按西方经济学划分,通货膨胀类型主要包括综合型通货膨胀和结构型通货膨胀。综合型通货膨胀

包括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包括鲍莫尔不平衡增长模型、希克斯—托宾“劳动力供给论”、斯堪的纳维亚模型。从我国的经济情况分析,80 年代的通货膨胀很难用西方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进行概括,因为西方国家(市场机制)和我国(计划机制)的经济机制不同。我国的通货膨胀同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有很大区别。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但是,有效投资或无效投资,合理投资或不合理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大不相同。作用不同,其后果也不同。由于投资的不确定性,因而很难把握其后果如何。有两点可以肯定,只要投资超越国力,通货膨胀一定会发生;只要投资无效或不合理,也会发生通货膨胀。当然,不排除有效投资或合理投资有时也会带来通货膨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固定资产特别是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规模、质量、结构和使用状况。经济要发展,就要追求经济增长。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力量,是任何国家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任何国家为求发展,都在追求经济增长,投资这一行为也在时刻进行。由于投资行为的不断及其非均衡,通货膨胀就在所难免。因而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是伴随着投资行为和经济增长而发展的,它的产生和消除都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既不成立,也不存在,在实践上更无成功的例子。困扰世界各国经济的通货膨胀都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点。

毋庸置疑,通货膨胀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但只要使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职工工资增长速度,而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又高于物价涨幅(即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就会利大于弊,就会促进经济增长。

四、走强增长与强改革之路

我国经济严重失衡,制约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经济既要再上新台阶,又要不致于产生恶性通货膨胀。可以说,我国经济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面临着双重压力。

经济再上新台阶,必须有巨大投资作为推动力量。由于国情复杂,若在投资问题上不能正确把握,就可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随之带来新的经济波动。在我国市场体系极不完善和行政惯性势力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波动发生时可能被迫采用行政手段这一老办法抑制膨胀,旧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复轨,这将给转轨带来新的障碍。因此,出路在于双“强”——强增长和强改革。

(下转第 12 页)

与此相反,如果是一般的中外合资企业再投资的项目(又称“第二代”合资企业),则不能享受伞型企业投资项目的待遇,在法律上不被承认是中外合资企业。

(4)纳税 我国税务机关对伞型企业和投资的项目,视为分离的两个实体,不要求上报综合收益表和纳税清单。伞型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所投资的项目分配的红利,而这部分红利通常是税后利润,因此,不再对伞型企业进行双重课税。

(5)经营期限和外汇平衡 伞型企业经营期限一般是 50 年,在此期限内,自主实现外汇平衡。

对伞型企业的管理和审批,由于尚无相应立法,只能参照中外合资企业法和外商独资企业法执行。伞型企业只向经贸部提交年报表,报告本年度投资项目的情况。

3. 伞型企业的发展思路

伞型企业在中国运作较好的有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美国 BEATRICE 公司(股权已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的合资企业。中信与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司也举办有伞型企业。泰国正大集团在上海与中国也合资建有伞型企业。独资的伞型企业在北京

有 IBM 公司和在深圳的杜邦公司。

上述外商大多数是国际上知名的跨国公司,是主要从事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其股票大多数在境外证券交易市场买卖。在中国举办伞型企业,参股投资如果在股权结构上占控股 50% 以上,那么,在中国所投资的企业应被认为是该公司的子公司,其股票上市很容易通过当地证券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只要股票上市,其利润会成倍往上翻番,其时对中国投资则必早已收回。

利用海外基金进行投资的公司,首先要通过伞型公司参股投资项目,但要参股的项目出让控股权则是十分艰难的,运用间接控股的方式和会计技巧可转换这一难题,在境外与项目单位成立一家合营控股公司,将其股份位置颠倒,境外公司实际上是间接控股,然后收购一家上市公司的壳子,将投资的项目填充进去,这称之为“借壳上市”。此做法,技术难度大,适合境外有实力的投资银行来操作。

目前,境外的投资银行纷纷对中国进行投资环境考察,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充足,借伞型企业这种利用外资的新形式,可为我们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 14 页)

强增长与强改革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战略问题,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强增长就不可能有强改革,而没有强改革则不可能实现强增长。强增长与强改革相结合,是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选择。

实现强增长主要取决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能否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总量看,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已有相当大的提高,1990 年与 1978 年相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企业提供的部分由 56% 降为 40%,集体企业由 42% 升为 50%,其他形式经济所占份额由 2% 提高到 10%;从就业结构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基本上是由非国有经济吸收的。很明显,在国有经济效益长期提高缓慢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向非国有经济相当规模的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国有企业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使我们认识到,90 年代我国经济活力的关键在于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因此,近期实现我国经济强增长取决于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非

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原因在于:不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竞争机制、风险机制、供求机制等都不能形成,价值规律也不起作用,就会出现非国有经济停滞,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失去活力,强增长无法实现。

强改革就是通过市场化改革的道路,在强增长的同时,结束双轨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市场化是一个配套改革的大战略,是价格改革、企业改革的主线,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导向和主线。强改革必须积极推进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加快培育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对于多余的职能部门要坚决“关停并转”,使行政资源配置方式让位于市场资源配置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了强增长与强改革这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选择。其思路是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以经济迅速发展为前提,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强增长与强改革两者的交互作用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责任编辑 王宏章)

(上接第 48 页)

法也应该改革,可考虑从经过多年实际检验的科研成果中进行严格筛选,减少获奖成果的数量,增加获奖成果的奖金数额,杜绝一项成果通过多途径重复获奖的不良现象。总之,要加强科技道德规范教育,在科技界树立科技道德意识;制定相应的法规,

严肃处理科研越轨的责任人;改革现行科研管理体制,健全原始实验记录,特别是实验程序、实验数据的管理系统。可试行人机结合及科研人员、编辑人员、执法人员与管理人员相结合的协同约束机制,制止科研越轨行为。

(责任编辑 刘先曙)